

太平军战事与全球茶叶贸易体系的重构

孙绍旭

内容提要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爆发的太平军战事,其烽火肆虐中国外贸茶区,造成茶叶供需紧张态势。战争导致茶区人口损失巨大,同时破坏冲击茶产业链,而且沉重的战争军费开支增加茶叶生产成本。由于国际茶叶消费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带来巨额利润,洋商对茶叶供应市场极为关注,而太平军战事则引发其对获得稳定持久茶叶供应源的巨大担忧。为获取茶叶并保证供应源的稳定,洋商除通过各种手段获取茶叶,还尽力在其殖民地如印度、锡兰等地培育茶树,试制茶叶,并获得巨大成功。在太平军战争期至战后中国经济恢复的时期,印度等茶叶外贸国迅速崛起,出口数额成倍增加;于是,茶叶供应由中国独家垄断之局向由中国、印度、日本、锡兰等共同供应的局面转变。因此,太平军战事开启了全球茶叶贸易体系的重构。

关键词 太平军战事 全球茶叶贸易体系 中国茶区 经济全球化

孙绍旭,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200241

宁德师范学院副教授 532100

新航路开辟数百年后,随着欧洲殖民者拓展殖民地步伐的推进,特别是鸦片战争打开中国门户后,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全球一体化步伐加快。太平天国战争正是在此背景下爆发的,并且它是一场范围广、时间长、破坏性大的战争。自1851年金田起义后,太平军转战广西,挺进两湖,并沿江东下,1853年3月定都天京,后又发动北伐和西征;在1860年底摧毁清军江南大营后,太平军向苏南、浙北和浙东发动进攻;纵横18省,历时十余年,先后攻占600余城。太平天国战争烽火肆虐了大半个中国,尤其对南方产茶大省造成冲击。近十年来,国内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的经济研究主要侧重于货币与财政、土地贸易等^[1],而关于茶叶经济的研究甚少。其中,仲伟民的《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

[1]有关太平天国经济方面研究有:赵后振通过考证和实地调查写就《太平天国钱币新考》(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李楠、林鑫采用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倍差模型认为太平天国战争对近代人口变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写就《太平天国战争对近代人口影响的再估计——基于历史自然实验的实证分析》(《经济学》2015年第4期);丁进军通过馆藏内务府全宗及宫中朱批奏折中选辑部分档案写成《咸同年间发行官票宝钞档案》(《历史档案》2017年第2期);牟振宇利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珍藏的法国领事馆契及相关土地资料,对上海法租界早期土地交易基本特征、时空变迁过

中的中国》(三联书店2010年版)一书,主要从茶叶贸易与鸦片贸易的变动和比较角度,揭示了19世纪中国社会的特点与危机,给予笔者诸多启迪。但该书并未将太平天国战争与茶叶外贸变动的关系,放到全球茶叶贸易体系中予以详尽考察。本文拟从全球史视域,聚焦太平军战事对茶叶产销体系中人口、交通、交易市场等产业链要素的破坏,以及其造成的税收政策的变动,探究其对中国茶叶贸易的影响,进而指出,其刺激其他茶叶外贸国的发展,并最终开启全球茶叶贸易体系的重构之门。

一、1851年前的全球茶叶贸易体系

中国唐代首创的榷茶制度,明确了官营茶园种植和加工茶叶垄断权。宋朝对榷茶制度进一步完善,即在全国范围内设置榷场六个、山场十三个,管理茶叶的生产和贸易活动,亦不许民间参与。后来各朝皆实行榷茶制度,只是对茶农生产的干预程度不同而已。

明清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对接益加紧密,在茶叶输出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清朝茶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清初至雍正年间,行茶马法,这是延续了明朝茶法。第二阶段从雍正年间至咸丰年间,行茶引法,开始重视茶税的征收,起初税率较低,后来逐渐提高。第三阶段从咸丰初年开始征收厘金及茶税,茶叶税负加重^[1]。至少在1828年及其前,中国供应国外(除日、韩)几乎全部茶叶的消费量。中国向英国、俄国、美国、加拿大、荷兰、德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和印度等输出茶叶,合计67203757磅^[2]。当时中国外销茶叶贸易体系的线路图为:茶农→茶行→茶商→十三行商→洋商→外国消费者。这构成世界的茶叶贸易体系。在茶叶贸易最为兴盛时期,为占有和夺取更多茶源,洋商使用预定制,并逐渐发展为预买制^[3]。而公行制度时期,规定广州为茶叶出口唯一口岸。根据相关记载,东印度公司许多年间输往欧洲的茶叶,95%以上是从广州运出的^[4]。公行制度的设置是当时国际形势下清政府无法完全关闭大门、置身事外的权宜之计;因此,公行除进行茶叶等贸易事宜之外,还附带处理一些外交事务。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前,茶叶对外贸易基本形成北通俄罗斯、西通欧美、南通南洋的格局,恰克图、广州是两大对外贸易中心。同时经西北陆路、西南陆路、澳门、南洋也有部分茶叶出口^[5]。鸦片战争后五口开放,与“泰西诸国通商,茶务因之一变。其市场大者有三:曰汉口、曰上海、曰福州。汉口茶,来自湖南、江西、安徽合本省所产溯汉水以运于河南、陕西、青海、新疆。其输至俄罗斯者,皆砖茶也。上海之茶尤盛,自本省所产外,多有湖广、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诸茶。江西、安徽红绿茶多售于欧美各国。浙江绍兴茶输至美利坚,宁波茶输至日本。福州红茶多输至美洲及南洋群岛。此三市场外,又有广州、天津、芝罘三所,洋南亦詹集焉”^[6]。随着一大批通商口岸的开放,一批相当固定的茶埠形成。中国茶叶海外市场迎来了短暂的辉煌时期。

这也从世界后起产茶国的首次输出记录中得到印证。印度种茶,始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7]。印度第一次出口茶是在1838年,那年有五百磅的茶运到英国^[8]。日本到1858年《安政条约》后才出口

程进行了深入探讨,写成《上海法租界早期土地交易、地价及其内在机理(1852—1872)》(《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2期);康健、孔康平基于《黟县碧山李氏宗派谱》记录写成《乱世中徽州民众生计模式的转变:基于〈黟县碧山李氏宗派谱〉的个案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1期);廖文辉通过户部银库的实银收支内容与数量写成《咸丰时期户部银库实银收支问题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等等。

[1] 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08页。

[2][8][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49页,第449页。

[3] 杨志洵:《中国制茶业之情形》,《商务官报》1906年第23期。

[4] 吴觉农、范和钧:《中国茶业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7页。

[5] 陶德臣:《清代民国时期中国茶叶海外市场容量分析》,〔南昌〕《农业考古》2014年5期。

[6][7] 赵尔巽编:《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653页,第3663页。

茶^[1]。锡兰加入茶的市场是在1883年,爪哇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加入^[2]。当时“泰西诸国嗜茶者众”,刺激了各国植茶业的发展,“日本、印度、意大利艳其利厚,虽天时地质逊于我国,然精心讲求种植之法,所产遂多”。这些洋茶进入国际市场后,中国茶外销市场“未几渐为所夺”^[3]。但在1852年前,中国绝对垄断地位明显。1849年中国出口茶(茶叶和茶砖)416447担(1担合50千克),印度出口1740担;中国茶占国际茶叶市场的99.58%^[4]。1852年中国出口茶叶699867担^[5]。1852年,印度茶叶仅对英国出口,达23.2万磅^[6],合2104担。中国茶占国际茶叶市场的99.70%。因此,1852年前,中国几乎独占世界外贸茶叶供应权,形成中国供应茶叶,英、美、俄等国消费茶叶的世界茶叶外贸格局。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虽然鸦片战争失败后《南京条约》的签订给中国茶叶外贸带来一些变化,即中国茶叶外贸由原来主要以广州和恰克图为口岸的两口通商发展为多口通商,但是,茶叶外贸的基本体系和运转程序并没有变化。由于中国在茶叶外贸中基本处于卖方垄断的地位,因此在1852年前,中国的茶叶贸易体系即为当时世界的茶叶贸易体系。茶叶从茶农手中被卖出后,经过茶贩、产区茶行、茶客、洋庄茶号、茶栈等环节,才到达洋行手中。有些有实力的“长腿”茶贩,可能与通商口岸的茶行直接联系,将茶叶直接运至口岸茶行那里^[7]。这些皆属于量变的范畴,即口岸数量增多、环节增多、公行垄断变成公行和私行并存、洋商与中国茶商接触面扩大等,但中国供应全球(除部分产茶国外)几乎全部茶叶消费之局没有变。然而,此种贸易体系却随着太平军战事及其推进而发生变化。

二、太平天国战争对茶产业链的巨大破坏

爆发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战争中心处于当时中国经济最为发达之区域,几与中国外贸茶区重叠,且此时期中国茶叶外贸处于卖方垄断地位,因此,其对中国当时乃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茶叶外贸供应链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据《中国军事史》的记录^[8],参合相关信息,对太平军战事特点概括如下。第一,时间长。据《中国军事史》的记录,从1850年思旺墟之役至天京失陷,太平军战事长达15年之久。如以捻军被灭为限,则长达19年之久;若以1872年李文彩部败亡为限,则长达23年之久。第二,范围广。太平军纵横18省,攻占600余城,并在部分区域建立统治。第三,战争次数多、规模大。仅据《中国军事史》的记录,主要战役68次,15年间年均4.53次^[9];是1840至1911年年平均数(3.05次)^[10]的1.5倍。1853年金陵之战,仅太平军投入兵力达20余万。1860年安庆之战,太平军兵力超过20万^[11]。1861年天京保卫战,仅李秀成部参战兵力即达20余万^[12]。第四,破坏力强。在与太平军交战中,清军主要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而太平军的西征、东征,虽“占领了大片领土,但是从没有进行有

[1]徐雪药、陈曾年、蒋学桢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35页。

[2][4][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49页,第449页。

[3]赵尔巽编:《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663页。

[5]陶德臣:《清代民国时期中国茶叶海外市场容量分析》,[南昌]《农业考古》2014年5期。

[6]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90页。

[7]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78页。

[8]《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中国军事史》(附卷)(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78—83页。

[9]未包含天京失守后太平军转战赣、闽、粤等地区以及从1850至1864年期间与太平军无直接关联的35次战争。参见《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中国军事史》(附卷)(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77—85页。

[10]蔡云辉:《战争与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119页。

[11]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第十七卷(上),[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页。

[12]中国近现代史大典编委会:《中国近现代史大典》,[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337页。

效的管理。他们唯一所做的就是大肆洗劫”^[1]。1857年太平军入闽,培田和升星吴氏两村“屋被焚者十之三四,被虏者百余”^[2]。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陷南京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3]。因此,时间长、范围广、战争次数多、规模大、破坏力强的太平天国战争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生产力产生巨大的破坏,当然也包括对茶产业链的破坏。

众所周知,我国产茶之地,以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为最^[4]。这几与太平军战事区重叠,因此,其对茶产业的破坏主要表现为:

1. 造成人口的巨大损失。战争伤亡、战争引发的瘟疫^[5]、战争对物质财富的耗费以及清军的坚壁清野政策引发的饥荒等,对战区及附近区域人口造成巨大的损耗。这场战争造成主要战区苏、皖、浙、赣、闽五省损失人口约7000万人。战争使中国人口损失了16.3%。若以五省计,战前人口约为1.57亿,战后人口损失了大约45%^[6]。据估计,南京和镇江的失陷使二百万以上人口落入太平军组织之手^[7]。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屠杀、瘟疫、饥荒以及同时或稍后发生的北方捻军起义和回民起义、南方少数民族起义造成人口的急剧衰减。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至少在1亿以上,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达7000万^[8]。虽然亦有人口损失5000万人的提法^[9],但即便是5000万,无论从绝对值或所占比率而言,亦蔚为大观。此外,战后移民亦为另一佐证。据估计,战后苏南地区接纳大约160~260万移民,浙江省约132万,安徽省约264万^[10]。

人口数量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直接影响着区域发展的水平、速度、方向等。就当时中国小农经济背景下的茶产业而言,一定数量的人口是促其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口压力促成一些农民选择种植收益更高的茶叶,以达成用更少的土地养活更多人之目的。所以,中国当时产茶区一定数量和密度的人口对茶叶外贸发展起促进作用。而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产茶区人口的巨大损失,自然影响到以小农经济为背景的劳动密集型的茶产业的发展,当然也对茶叶外贸带来影响。

2. 对茶产业链造成冲击。战争中的大规模杀戮造成民众心理恐慌,并由此引发大量人口逃离家园,破坏了原来茶产业的运转程序。太平军战事对茶产业链中种、制、运、销等环节的冲击,主要表现为:第一,战事造成大面积茶园荒芜,产茶量受损。遭遇太平军战祸后,“自昆至苏(州)境转荒落。……由是而无锡,而常州,而丹阳,蔓草荒烟,所见一律。……岸曲阿房,尽成灰烬。城煌旧址,蹂躏尤深,行四五里,不见一人,亦无一物”^[11]。(杭、嘉、湖)三府,“田地山场大半荒弃”^[12]。江、浙、皖三省的广大农村“几乎百里无人烟……家庭焚毁,田亩无主,弃而不耕”^[13]。“安徽广德,自庚申至甲子五年

[1][美]萧邦齐:《九个世纪的悲歌——湘湖地区社会变迁研究》,姜良芹、全先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166页。

[2][清]泰钧:《乡劫记》,转引自《培田吴氏族谱》卷终,福建连城培田吴氏宗祠藏光绪三十二年刻本。

[3]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6页。

[4]赵尔巽编:《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651页。

[5]邓泽辉:《灾荒——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昌吉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第55-59页。

[6]曹树基、李玉尚:《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上海〕《复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5期。

[7]龚咏梅:《孔飞力中国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页。

[8]葛剑雄、侯杨方、张根福:《人口与中国的现代:1850年以来》,〔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9]李楠、林嘉:《太平天国战争对近代人口影响的再估计》,〔北京〕《经济学》2015年第4期。

[10]周武:《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上海〕《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11][清]毛祥麟:《甲子冬闹赴金陵书见》,《洪杨遗事》第1辑(中华文史丛书之十六),〔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第16页。

[12]转引自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

[13]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61页。

中,民不得耕种,粮绝,……人相食,而瘟疫起矣。……几数十里无人烟”^[1],安庆决战后,“户口流失,田地荒芜,耕种失时”^[2]。耕种失时的情况下,更遑论作为农副业的茶叶种植。往昔殷庶的赣江西岸“人烟寥落”,“不闻鸡犬声”^[3]。在福建省,太平军四次入闽,进攻闽北、闽西、闽西南、闽南,先后攻占光泽、邵武、崇安、清流等18县(府);二度攻占汀州府城、泰宁、宁化等7县(府);三度攻占建阳、建宁等^[4]。

第二,战事引发包括茶商在内的众多民众迁徙逃难,因而阻滞茶产业链顺畅运转。1852年太平军进军两湖,长江中下游地区即开始“人心惶惑”,“自上年(指咸丰二年)湖南省城被围后,即有安徽动摇之说”^[5]。1853年初,太平军陷武昌,自汉口东下后,南京城中“已有豫为迁出者,癸丑正月陷安庆,人心益惶恻,迁者甚众”^[6]。海宁被兵后,到处“携老挈幼,奔走仓皇”^[7]。苏州也开始有居户搬迁,“先是搬者少,自巡抚杨文定一出安民告示,而人心反感,始自官署家眷先各远避,而绅富遂纷纷矣”^[8]。

第三,战事对商业中心的破坏,影响茶叶交易的顺利推进。战事对南昌、赣州、安庆、九江、长沙、扬州、镇江、嘉兴、杭州、合肥、福州、宁波、襄樊、常德、苏州、景德镇等城市影响巨大^[9]。成为战场,对城市商业的破坏最为致命。如1860年5月,太平军挥师江南,“清朝官吏下令烧毁苏州护城河与城墙之间的一切房屋”^[10],并且,“凡放火之处,掳掠一空”^[11],经数百年形成的手工业基地也“被兵火毁于一旦”^[12]。淮军和常胜军攻克后的苏州是一幅“房舍桥梁,尽被拆除,十八里中杳无人烟,鸡犬牛马亦绝迹”的惨象^[13]。再如1853年太平军攻克武汉三镇,山西票号业主命令南方各据点紧缩业务,撤退资本;太平军北伐时,京师震动,“钱铺闭歇者,自二月十五日相继,共二百家……西客收帐,商票歇业”^[14],“上游各大镇,多被焚掳净尽,商本或早已经收回,铺户又乏本歇业”^[15]。因太平天国起义造成现款支付困难而使“苏州制度”得到加强^[16],中国外贸茶商多苦于资本不足,票号撤退,商业中心被毁,无疑对茶产业是雪上加霜。

第四,战事阻隔交通,阻滞茶叶购销。战争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交通建设的发展,但同时,战争又破坏交通设施。这是因为战争通常打击的目标是“工业和商业、重要的建筑物……运输动脉中心以及平民人口地区”^[17]。在战争中,江南产茶区域交通阻滞极为严重,主要表现在交战阻碍交通系统正常运行、战争对交通系统的破坏、征用交通工具影响交通。如浙江萧山,交通被破坏,河

[1] [清]胡有诚:《广德州志》, [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25页。

[2] 转引自朱庆葆:《传统城市的近代命运——清末民初安庆城市近代化研究》,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3] 吴雯、谢敏华:《试论太平天国革命对近代江西农村社会的影响》,《宜春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4] 徐晓望:《福建通史》(第五卷),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120页。

[5] 《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78页。

[6] [清]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85页。

[7] 海宁市珍稀史料文献丛书委员会整理:《海宁小志集成》, [北京]方志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8] 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 [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第45页。

[9] 蔡云辉:《战争与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 [成都]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207页。

[10] 王崇武等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 [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128页。转引自王卫平著:《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

[11] 吴大澂:《吴清卿太史日记》,《太平天国》(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7-329页。

[12] 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13]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8页。

[14] 白寿彝:《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

[15] 董继斌、景占魁:《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页。

[16] 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 [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17页。

[17] [英]J. F. C. 富勒:《战争指导》, 旋旭译,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页。

流被摧毁^[1]。太平军相继控制和威胁运河沿岸城市苏州、杭州和扬州,使得南北漕运和货运不畅。长江商路梗塞,南北商船多被交战双方征用^[2]。在起义开始的几年中,茶叶运输不是取道危险的长江,而是从安徽、江西、福建和浙江,经陆路翻山越岭,最后抵达上海^[3]。对茶叶运输系统的破坏,自可推知。

3. 沉重的军费冲击茶产业。为了赢得战争,必须保障军费开支。因此,清政府想尽办法筹措军饷,最为突出者即为“厘金”之法的推行。这自然影响到茶产业种制技术的改进和提高与茶产业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征厘较多的省份江苏、安徽,都设立总局3个,其余省份基本设立总局1个。但是各个省内分设的局卡数多寡不一,较多者如云南(373个)、江苏(约254个)、浙江(316个)、湖南(210个)、福建(212个)等,厘卡较少者如直隶(11个)、山东(14个)、广东(26个)等。各省局卡数总计2500个^[4]。浙江、江西、福建的厘金达到10%,江苏的单次征收比率虽低,但实行遇卡捐纳导致实际征收比率最高,可达20%以上^[5]。据估计,自咸丰三年(1853年)创设至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陷落止,以平均每年征厘1000万两计,十年中厘金收入用于军费支出数额的,共有1亿两。同治初年(1862年)以前,各省厘金收入几乎全部用于军费^[6]。1担中国茶叶所包含的税款,包括厘金在内,大约为4.1两至5.4两,为茶叶价值的35.5%左右^[7]。可见厘金征收之巨,亦可见军费开支之巨。在厘金重压下,民不聊生,如首推“厘金”之法的扬州,“商人……十有八九亦遭荼毒”,侥幸脱身的商人,也是家资罄尽^[8]。清政府对江西人民大肆征索,以致“无论大户中货,捐输之事,至再至三,筋谷皆尽”^[9]。被战火蹂躏的江南徽州,又被清廷勒索助饷,以致曾经富极一时的徽商现在则“萧条四壁,不复成家”^[10]。曾经“汇通天下”的晋商在清政府繁重的“捐输”之后,“数年来,无论如何追逼,讫无分厘提到”^[11]。此外,“中国的官员们在他们的政府制度处于衰败时期只关心从其本人的职位谋取利益”^[12]。还有如黄国盛先生所说:“当涉及华商如何发挥本国资源优势,通过直接贩运茶丝出洋,以利于华商获取商业利润的发展大计时,清政府宁可肥水外

表1 1825—1910年九省上报丰收、平收和歉收的州县的百分比

| 年份 | 报告数 | 丰收 | 平收 | 歉收 | 年份 | 报告数 | 丰收 | 平收 | 歉收 |
|------|-------|-------|-------|-------|------|-------|------|-------|-------|
| 1825 | 1,192 | 46.47 | 51.67 | 1.84 | 1870 | 1,255 | 4.86 | 45.01 | 50.11 |
| 1830 | 1,321 | 39.64 | 61.54 | 1.51 | 1875 | 1,308 | 6.19 | 53.66 | 40.13 |
| 1835 | 1,229 | 20.17 | 65.58 | 14.23 | 1880 | 1,309 | 7.79 | 52.94 | 39.26 |
| 1840 | 1,304 | 25.07 | 67.02 | 7.89 | 1885 | 1,246 | 6.26 | 49.51 | 44.22 |
| 1845 | 1,306 | 29.24 | 63.93 | 6.81 | 1890 | 1,309 | 5.27 | 45.37 | 49.35 |
| 1850 | 1,019 | 22.27 | 72.32 | 5.39 | 1895 | 1,243 | 3.94 | 45.29 | 50.76 |
| 1855 | 979 | 14.09 | 65.67 | 20.22 | 1900 | 1,190 | 4.28 | 42.85 | 52.85 |
| 1860 | 752 | 20.21 | 59.04 | 24.73 | 1905 | 1,198 | 4.00 | 43.24 | 52.75 |
| 1865 | 1,087 | 5.79 | 53.81 | 40.38 | 1910 | 1,126 | 4.61 | 37.74 | 57.63 |

注:报告数包括了九个省中八个省的夏季报告和秋季报告;因此上报的州县数约为全年报告数的一半。

材料来源:根据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61—769页的材料计算。这些材料的出处是应以以下谕旨上报的报告:“户部。嗣后查报各省收成分数,应以八分以上为丰收。六分以上为平收。五分以下为歉收。”见《大清高宗圣皇帝实录》卷339,〔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1页,1749年6月14日。

[1][美]萧邦齐:《九个世纪的悲歌——湘湖地区社会变迁研究》,姜良芹、全先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页。

[2]董继斌、景占魁:《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页。

[3]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63页。

[4]数字来源参照郑备军:《中国近代厘金制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152页。

[5]转引自郑备军《中国近代厘金制度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145页。

[6]参见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8页。

[7]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13页。

[8]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60页。

[9]杜德凤:《太平军在江西史料》,〔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1页。

[10][11]张海鹏、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合肥〕黄山书社1983年版,第338、47页,第361页。

[12]《领事文极司脱关于1867年度上海贸易的商务意见摘要》,转引自李必樟译《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157页。

流,也要对华商加以抑制。”^[1]

由表1可以看出:第一,以1850年为界限,1850年前的上报州县为1200个左右,少者1019个(1850年),多者1321个(1830年);歉收州县最多者14.23%(1835年),其他五个年份皆低于10%,最低者1.51%(1830年);平收州县占一半以上,多者72.32%。整体较好。第二,自1851年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无法上报的战事州县不断增加。如以1850年上报州县数为参数(1019个),无法上报考者归入歉收州县之中,则1855年歉收州县占23.35%;1860年歉收州县占44.45%。此亦较为符合太平军战事对左近的破坏度。从1855年开始至1870年,歉收州县数量急剧增加,最低为23.35%(1855年),是此前最高年份的1.64倍;最高50.11%(1870年),是此前最高年份的3.52倍;平收州县2个年份过半,最少者43.47%(1860年)。歉收州县和平收州县数及其所占百分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争的破坏度。

此外,太平天国统治区域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如门牌捐、田捐、店捐、船捐、火药捐、礼拜捐、股捐、月捐、日捐、房捐、局捐、灶捐、丁口捐、犒师费等,共有二三十种^[2]。

综上,太平军战事对战区及附近地区茶产业人力的损耗、对茶产业各环节的影响以及巨额战争费用等对茶产业链的冲击破坏,使茶叶供应无法满足世界消费市场的需求;与此同时,亦使洋商形成中国茶叶不易获得或者无法获得之观念。为获取实现超额利润的茶叶,洋商绞尽脑汁在中国创新获取茶叶途径的同时,也加速推进左近国家和地区的茶叶试验、培育和发展,以拓展新的茶叶供应地。

三、供需失衡与重构全球茶叶贸易体系

自17世纪以来,中国茶叶作为外贸商品,在逐步走向全球的同时,也输出了“茶文化”,培育了茶叶消费市场。1780—1833年,中国茶叶输出增长530%,年均增长3.53%左右^[3]。这一消费市场在“五口通商”后不断扩大,到太平军战事前渐趋成熟。按陶德臣的研究,1844年,上海出口茶叶1149000磅,加上广州,出口茶叶共70476500磅,合639352担。1843年中国输入俄国茶叶为12万箱(每箱约50斤),约合6万担^[4]。1838年印度第一次输出茶叶500磅,合4.5担,而1849年其出口1740担^[5],1838—1849年年均出口145担。如果俄国1844年茶叶输入以1843年为参数,1844年印度茶叶输出取平均数145担,那么,除产茶国(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下同)外,全球当时茶叶消费市场699497担。到1852年,中国外贸茶叶为1117354担^[6],印度出口茶232000磅^[7],合2104担。除产茶国外,全球茶叶消费量为1119458担。相较于1844年而言,1852年全球茶叶消费增长160%,年均增长12.69%。如以此增长率(12.69)为参数,那么到1868年,中国茶叶出口应达11245768担;事实上1868年中国出口1441000担,仅为此预计增长数的12.81%。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即太平军战事的不断推进。特别是从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到1856年达到鼎盛的时期,清政府与太平军之间的战争也进

[1]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页。

[2]林志杰:《太平天国腐败亡国及其警世意义》,〔南宁〕《学术论坛》2015年4期。

[3]根据《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至英伦本土茶叶量的发展趋势(1760—1833年每年平均数)》数据整理,转引自严中平:《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统计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5页。

[4]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埠群论析》,〔合肥〕《安徽史学》2016年第6期。

[5][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49页。

[6]1852年中国广州、上海两个港口输出茶93292250磅,合846333担;1851—1860年年均向俄输出茶363000普特,合13108333.33磅、118916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估计,中国由陆路运销中亚等地,或由中国帆船运销朝鲜和印度支那等地的茶叶,即海关统计以外的出口茶叶,一年至少有150千担。参见陶德臣:《清代民国时期中国茶叶海外市场容量分析》,〔南昌〕《农业考古》2014年5期。

[7]陶德臣:《清代民国时期中国茶叶海外市场容量分析》,〔南昌〕《农业考古》2014年5期。

入白热化、胶着状态。于是,鉴于主要战场几乎与产茶省如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两湖等重叠,残酷的战争显然滞缓、延迟了茶产业的改进、提高。

战争造成国际茶叶供需严重失衡。1868年中国出口茶1441000担,而世界总销量为229084400磅,合2078218.7担^[1]。从1852年至1868年,全球茶叶消费增长186%,而此间中国出口茶增长129%^[2]。太平军战事对茶叶出口贸易产生了极大影响。尽管这一时期包括茶叶在内的农产品的出口在数量上都有增长,但如果没有战乱,增长应该会更大。战争对中国出口贸易所造成的一个直接影响是茶叶的价格和供应极不稳定^[3]。马士的研究亦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这一事实:1849年中国出口茶(茶叶和茶砖)416447担,印度出口1740担,中国占99.58%强;1867年中国出口茶(茶叶和茶砖)1313567担,日本出口89544担,印度出口53130担,中国占90.02%;1886年中国出口茶(茶叶和茶砖)2217201担,日本出口275823担,印度出口551078担,锡兰出口60833担,爪哇出口44010担,中国占70.41%^[4]。从1849年至1886年,全世界需求增长7.53倍,中国茶叶增长5.32倍。

众所周知,随着饮茶之风在全球的迅速蔓延,进行茶叶贸易的洋商获得巨额利润。而五口通商,使洋商掠取茶叶更为便捷。然而太平军战事却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妨碍洋商获取茶叶。各国商人在绞尽脑汁获取更多茶叶的同时,也加速推进开拓和培育新的茶叶供应地。

1. 拓宽获取中国茶叶的流通渠道。第一,强迫清政府在传统产茶区开通更多通商口岸以获取茶叶。为此,英法等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系列条约,增开大量通商口岸。如1858年中英、中法、中美、中俄《天津条约》中规定开放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系列通商口岸;1860年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主要内容是:清政府承认《天津条约》有效,增开天津为商埠。让中国开放更多港口城市,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保证在内战形势下获取所需的茶叶。正如总税务司赫德所言,条约“总是制定者从外国立场出发强迫签订的。因此,极端重视的首先是要求外部(国)贸易的发展,而不是发挥(中国)内部的潜在能力”^[5]。

第二,开辟获取茶叶新的通道。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切断武夷山茶叶通往广州和上海的通道。为了获取茶叶,美国旗昌洋行派遣代理人携巨款到武夷山茶区收购次年贸易用的茶叶,并顺闽江至福州,装船出口,获得巨大成功,“满载而去”,并且“获得了庞大的利润”。据海关统计,1854年从福州输出的茶叶为13万担,1855年从福州出口的茶叶增至27万担^[6]。

第三,与太平天国政权进行茶叶贸易。为获得能带来超额利润的茶叶,洋商敢于犯险,到太平天国控制区域,与太平天国政权进行茶叶贸易。1848年至1860年

表2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前后对外茶叶贸易情况一览表

| 年份 | 茶(磅) | 年份 | 茶(磅) | 年份 | 茶(磅) |
|-----------|----------|-----------|----------|-----------|----------|
| 1848—1849 | 47240000 | 1852—1853 | 72900000 | 1856—1857 | 61460000 |
| 1849—1850 | 53960000 | 1853—1854 | 77210000 | 1857—1858 | 76740000 |
| 1850—1851 | 64020000 | 1854—1855 | 86500000 | 1858—1859 | 65789792 |
| 1851—1852 | 65130000 | 1855—1856 | 91930000 | 1859—1860 | 85938493 |

[1]1868年印度茶销量为8132.4千磅,日本销13487千磅,爪哇销2000千磅,中国销205465千磅,世界总销量为229084.4千磅。参见陶德臣:《清代民国时期中国茶叶海外市场容量分析》,〔南昌〕《农业考古》2014年5期。

[2]王力认为,中国茶叶外贸的深层危机从19世纪60、70年代上海、汉口、福州等主要茶叶出口口岸的海关报告中不时可以看出,其只是被表面繁荣掩盖。参见王力:《清末茶叶对外贸易衰退后的挽救措施》,〔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

[3]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63页。

[4][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49页。

[5][英]赫德:《关于中国洋关创办备忘录》,转引自魏尔特《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上海〕海关总署统计科1938年版,第179页。

[6]卫京生:《福州开辟为通商口岸早期的情况》,《福建文史资料》(第一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56、157、159页。

太平天国对外茶叶贸易情况如表2所示^[1]。

李秀成经营苏浙时就有“茶、丝换军火”之事,当时的太平天国辖区对外贸易是“流民雨集,百货云屯,自江浙以达上海,帆樯林立,来去自如”^[2]。

2. 开拓和培育新的茶叶供应源。早在此前,担任印度总督的亨利·哈丁(Henry Hardinge)就对如何稳定获取茶叶表示担忧,认为基于北京政府完全有可能在几年内将中国的鸦片种植合法化的推断,最理想的对策是尽可能地鼓励在印度进行茶叶种植^[3]。而太平天国战争加大了获取茶叶的难度并增加了外商的担忧。外商韦伯推断,“如果叛军能实现他们所声称的占领汉口、九江等沿江口岸的意图,那么不管什么茶,一箱也进不了上海”,他对于下一个茶季很悲观,认为“河口地区和宁州大部分地区叛军大肆劫掠,茶行被毁,农民星散,这自然会减产”^[4]。再加上中国地方官员趁乱在茶区肆意收受贿赂,“在外国人购茶款额的总数中,估计有22%或约全数的四分之一是向中国官员们缴纳的税款”^[5]。地方官员的贪腐行为,也迫使英国人加紧开辟新的茶叶供应基地。在获取茶叶难度加剧的情况下,受茶叶贸易超额利润的刺激,加速培育新兴茶叶贸易国被外商提上日程,而新兴茶叶贸易国的出现和成长,意味着全球茶叶贸易体系重构的开启。关于新兴茶叶贸易国的茶叶外贸情况主要如下:

(1)1834年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后,其开始认真考虑种植茶叶事宜。但是,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初,印度茶叶的种植,还只是停留在试验阶段,并没有想到要在短期内提供一项重要的输出品^[6]。如前所述,1838年印度出口茶叶4.5担,1849年印度出口茶叶1740担;1852年,印度茶叶对英国的出口23万多磅。19世纪50年代,英、印致力于探讨种制技术,“运用了更多的知识技术及资本”^[7]。特别是1853年,经阿萨姆经理威林生大力提倡,减少3—4月的采量,印度茶业才走上正轨。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印度茶园面积不断扩大。茶园数量不断增多,植茶公司日益增多,1858年已有30多个^[8]。印度茶产量稳步增长,已达到相当数量。1852年印茶输往英国的茶叶量为23.2万磅,1859年突破百万磅大关,1863年又比1859年增加1倍多,1871年印茶入英为1531.16万磅^[9]。

(2)1600年荷兰人最早在锡兰试种中国茶树,未能成功。1840年左右,锡兰移入印度阿萨姆茶苗200余株试植,稍有成绩,但发展缓慢^[10]。1841年,德国人瓦姆带回中国茶苗植于锡兰塞拉华的罗斯却特咖啡园,其后瓦姆及兄弟将茶苗移植于沙格马繁殖,并在康得加罗种植中国茶籽^[11]。1854年种植者协会成立,茶叶生产得到发展。1866年泰勒正式试制样茶成功,在伦敦受到欢迎。翌年,他开辟茶田

[1]本表由吟喇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工维周、工元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后附表之二中国茶丝输出贸易表改编。

[2]王韬:《菉园文集外编》,[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73页。

[3][美]萨拉·罗斯著:《茶叶大盗——改变世界的中国茶》,孟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6—17页。

[4]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323页。

[5][《领事麦华陀1868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转引自李必樟译《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6]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ed.), *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 London: Harrison and Sons, 1875—1876, p.27.

[7]陶德臣:《印度茶业的崛起及对中国茶业的影响与打击——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南京]《中国农史》2007年第1期。

[8]陶德臣:《南亚茶业述论》,[南昌]《农业考古》1996年第4期。

[9]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86页,第1188—1189页。

[10]陶德臣:《英属锡兰茶业经济的崛起及其对中国茶产业的影响与打击》,[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

[11]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资料》(二),[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395页。

20英亩,1868年又输入阿萨姆杂种试种。1873年锡兰仿印度采用机器制茶,茶业日益发展^[1]。19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种植园的产品在国内外已经获得很高的评价”,“许多在咖啡业有投资的人,已经把注意力转向种植茶树,即便不以茶树代替咖啡,也以之作为咖啡的辅业”^[2]。1876年锡兰出口茶200万磅,1877年增至1700万磅,1880年后超过10万磅^[3],1883年达152.3万磅,1887年接近千万磅^[4]。

(3)16世纪末日本茶产已经发展到全国,主要有九州、四国、本州三大茶区,其中以本州岛的静冈最为著名^[5]。1856年,日本茶叶开始输往美国,是年仅50小箱,翌年也不过400小箱,数量很有限^[6],“安政六年(1859年),横滨开港,米(美)国商人始稍稍购茶……其后输额递加,栽植益盛”^[7]。19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茶叶年出口美国10万小箱,近400万磅,比3年前增长2000倍。从1870—1871年度起,日茶始以美国为主要销售对象。1874—1875年度运美日茶,第一次超过了中国绿茶,达2250万磅^[8]。日本出口茶叶量为:1868年,101155担;1873年,133398担;1878年,197566担;1883年,278655担^[9]。

(4)1728年爪哇首次真正植茶。1826年爪哇又开始新的试植,同时也开始试制茶叶。1838年巴达维亚的茶厂建立,收集附近茶园鲜叶进行加工制造。1839年爪哇茶已输入荷兰,但此时爪哇茶质量很差,成本昂贵,售一镑要亏本六、七角之多。1860年爪哇茶产量约200万磅^[10]。1884年荷属东印度出口爪哇茶叶563.8万磅,占世界茶市的1.8%,排名在中国、印度、日本之后^[11]。

从以上新兴茶叶外贸国的兴起过程可以看出:第一,其兴起时间大多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如印度虽在1838年首次试验成功,但出口只有500磅,合4.5担;到1849年仅1740担左右,1852年为2104担。且按《茶叶大盗——改变世界的中国茶》之记述,亦可看出,至少1852年前,相对于国际茶叶市场消费额而言,印度茶叶产量可谓微不足道^[12]。但此后迅猛发展,1859年突破百万磅大关,而1863年突破200万磅。锡兰于1854年成立种植者协会,发展茶叶生产,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茶产业链的初步形成及其对茶产业的重视。日本于1856年,开始向美国输出茶叶,其在太平军战事期间增长的速度几与印度相近。1839年左右,爪哇茶与印度茶情况相似,而1860年爪哇茶产量约200万磅。为什么这些国家多在此间试验成功和扩大生产呢?这当然与高额利润刺激分不开,而供不应求为高额利润产生之基础。太平军战事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供不应求之局的出现亦显而易见。此亦增加外国茶商获得茶叶的忧患意识,同时利润的提升刺激各国加速投入,推进研究。此前各国茶叶生产在很长时间内都处于试验阶段,之所以能在短期实现突破,虽存在不断探索和积累经验的因素,但是太平天国战争造

[1]陈椽:《茶业通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91—92页。

[2]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88—1189页。

[3]海关总税务司署:《访察茶叶情形文件》,转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47页。

[4]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1页。

[5]夏开儒:《世界茶叶地理概述》,《贸易月刊》1942年7—8月号,第35页。

[6]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一),〔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57页。

[7][清]黄遵宪:《日本国志》卷38,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8]陶德臣:《近代日本茶产与市场——兼论对中国茶业的影响》,〔南昌〕《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

[9]Walther Hoffmann, “Foreign Trade of Japan. A Statistical Survey”,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Vol.46, 1937.

[10]转引自陶德臣《荷属印度尼西亚茶产述论》,〔南昌〕《农业考古》1996年2期。

[11]吴觉农:《中国茶叶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69、168、171、193页。

[12]如果印度1848年前茶叶种制成功,则无与罗伯特·福钧签订偷盗中国优质茶种之必要,且按罗伯特·福钧之日记,1849年秋茶苗偷运至印度成功,根据茶苗生长周期(8年左右为盛产期)等推知,1859年左右印度茶叶外贸大发展与罗伯特·福钧偷运茶苗,培育成功并推广种植关系密切(参见[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的中国茶》,孟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02—225、250—270页)。当然,发生于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对东印度公司生产茶叶的影响也应被考虑在内。

成的供不应求局面和由此带来的超额利润的刺激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主导作用。第二,新兴茶叶外贸国发展时期大体在太平军战事末期至19世纪80年代。太平军战事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损失,直至19世纪80年代经济才基本恢复^[1]。以中国向英国输出的茶叶为例,1866年,中国向英国输出茶叶126872000磅,1871年150295000磅,1876年152168977磅,1881年152559000磅;16年间中国向英国输出的茶叶增加20%强,但1871—1881年十余年间,仅增长1.5%^[2]。此间印度和日本的茶叶出口增长最为突出。比较中国和印度向英国输出的茶叶量如下:1866年,印度输出4371000磅,中国输出126872000磅;1871年,印度13700000磅,中国150295000磅;1876年,印度26733220磅,中国152168977磅;1881年,印度48862000磅,中国152559000磅;印度茶叶输出量从1866年占中国茶叶输出量的3.44%,到1881年占中国的32%^[3]。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茶叶,新兴茶叶外贸国发挥后发优势,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迅速提升茶叶产量,终于成为中国的强劲竞争对手,不断抢占全球茶叶市场份额。例如1867年中国茶叶输出占全球总量的90.02%,但1886年中国茶叶输出占全球的70.41%,1905年则降至29%^[4]。至此,经过太平军战事的破坏,洋商担忧战争影响茶叶供应,为解决稳定获取茶源问题,促成新的茶叶外贸国的兴起和成长,全球茶叶供应终于由中国垄断世界茶叶外贸市场的格局向中国、印度、锡兰、日本、爪哇等国共同供应全球贸易茶叶的格局转变。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初步结论:第一,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垄断世界茶叶消费市场。印度在1838年开始出口茶叶,但只有500磅,合4.5担;1849年印度出口达1740担,但中国占有茶叶外贸市场的99.58%。1852年,中国外贸茶叶为1117354担,印度为2104担,中国占有茶叶外贸市场的99.81%,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而在此期间,中国茶叶的增长速度基本上能满足世界茶叶消费的增长速度,且出于创新风险等的考虑,一些欲从事茶叶外贸的国家多处于茶叶种植试验阶段,且进展缓慢。印度和爪哇有些许茶叶出口,日本没有茶叶外贸。因此,中国的茶叶贸易体系即为世界茶叶贸易体系。

第二,太平天国战争破坏和削弱中国原有茶叶种制运销体系,造成全球茶叶供不应求的局面。中国的外贸茶叶生产是小农经济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主要集中于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两湖和两广等地区,这也是太平军战事的核心区域。而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太平天国战争时间之长、范围之广、战争之惨烈、破坏力之大都堪称第一。太平军战事大大损耗此区域劳动力,破坏茶园的种制运销,造成巨大财富损耗,增加茶产业成本,减少本可运用于茶叶研究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等等,从而使茶叶供应的增长速度无法满足世界消费需求速度的增长,造成供需矛盾。为获取实现超额利润的载体——茶叶,洋商们想尽办法,其中之一即开拓新供应源。

第三,洋商通过新途径获取茶叶和加速开拓、培育新的茶叶供应地的过程,亦促成全球茶叶贸易体系的重构。洋商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产茶区附近增开通商口岸、开辟购买茶叶新通道、与太平天国政权进行茶叶贸易等途径获取茶叶以谋求暴利。但由于战争的破坏,中国茶产业恢复缓慢,不足以满足世界市场增长之需,于是洋商在自己控制的印度、锡兰、爪哇等殖民地加速研究茶叶种制运销;同时,巨额利润也推动日本茶叶外贸的大发展。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及战后中国经济恢复的时期,新兴茶叶外贸国茶叶种制试验取得成功,并以资本主义大农场的经营方式加以推广。终至19世纪70、80年代,新的全球茶叶贸易体系取代了由中国垄断世界茶叶贸易市场的旧的全球茶叶贸易体系。

因此,可以明确,太平天国战争开启了全球茶叶贸易体系的重构。

[责任编辑:道成]

[1]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23页。

[2][3]福州海关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北京〕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第136页。

[4][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50页。